

# 论 1920 年湖北省长人选引发的政潮

朱 英 张 超

**内容提要** 围绕 1920 年湖北省长的人选、就任、省署驻地之争等问题,湖北地方社会与督军王占元发生了激烈冲突。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是中央政府任命王占元亲家孙振家为湖北省长,引发了湖北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中央政府俯顺舆情,转而任命夏寿康为湖北省长,又引起督军王占元的不满,王多次向中央提出请假和辞职。在中央的多方斡旋下,王占元、夏寿康明迎暗拒。夏寿康到任后,相继发生了孙传芳兵逼夏寿康事件以及省署驻地问题之争,又使这一冲突白热化。湖北省长人选的一波三折政潮,既折射出王占元督鄂后期湖北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变动,又展现出民国初期省制纠结中践行省自治的新景象,同时也可看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面向。

**关键词** 省长问题 王占元 中央政府 夏寿康 省制

朱 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430079

张 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430079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其第一发生之大问题,悬于吾等之目前者,即地方制是也。”<sup>[1]</sup>地方制即省制,省制中以省级之行政运作为重要内容,而省级行政中又以省长人选问题最为地方社会所关注。因为省作为地方一级最高行政组织,“省长是地方政治重心,在行政主导的政治制度下,掌握了全省最高行政机构,就取得了号令全省的资格”<sup>[2]</sup>。故而如何在省长问题上兼顾各方利益,体现民主共和精神,成为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之省长选任,常常是牵动民国地方政局演变的关键因素,也是地方社会借以对抗军阀,实行地方自治的一种工具。1916年至1928年,省级政权制度名义上一直存在着省议会、省行政体制、省军政体制的三权分立机制。自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主政,中央对各省控制力日趋减弱,

[1] 佘父:《中华民国之前途》,《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1912年4月1日,第2-3页。

[2] 丁旭光:《变革与激荡——民国初期广东省政府(1912-1925)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75页。

各省督军<sup>[1]</sup>各自为政,把持地方军政大权,各省省长、省议会多为督军之傀儡,地方各项事务陷于停滞。此时伴随着地方自治呼声的兴起,各省地方人士纷纷提出军民分治、省长民选之主张,以图践行民主共和精神,削弱督军势力。在中央政府权力衰微、军阀势力坐大、民众自治力量不断发展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省制中的省长选任问题更呈现出复杂态势。

对于民国省长问题,不少学者已经做过相关的考察<sup>[2]</sup>,其中既有宏观层面的综合探讨,也有以省议会与省长为个案的微观考察,尤其霍龙飞的《1920年苏鄂两省省长更迭风波》一文直接论及1920年江苏与湖北两省省长的更迭,但该文之主旨在于通过江苏与湖北两省省长更迭问题探讨地方自治与废督运动,具体论述也较为简略。从已有相关成果看,绝大多数均较少从地方社会、省长与督军互动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即试图在这方面略作弥补,冀希围绕1920年湖北省长更迭政潮,通过对一系列相关事件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透视王占元督鄂后期湖北社会政治与利益博弈的某些复杂面向,同时也借助该事件重新审视民国时期省制纠葛中关于省长问题的多重面向。

## 一、省长问题与“倒孙运动”

辛亥鼎革后,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对于省制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有两个重要的考虑:第一,行政区和军政区,行政长官和军政长官的职权如何划分?第二,民政长官是民选抑或中央任命<sup>[3]</sup>。自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为加强中央集权,主张实行军民分治,各省民政长官由中央委派。皖系主政中央后,奉行以武力统一中国,为削弱地方实力派,也主倡实行军民分治。此时地方兴起自治浪潮,民众多主张实行省长民选。如当时担任律师的施洋就提出,为求省长问题之根本解决,“以余管见所及,与其听少数者或武人之力所播弄,终成辗转反对之局势,不如建筑于全省民意之上,一劳永逸之为愈,此余所以希望反对湖北省长的人,进一步主张民选”<sup>[4]</sup>。其实省长问题历来也是人民与督军所争执之问题。当时人就认为,“盖以前之省长,几为督军之私物,非督军自兼者,即为督军之私人。然而省长为民政之官,自与人民有密切之关系,人民又乌肯默视。故如督军愿,则于人民有不利,如人民愿,则于督军又感不便,此所以将来必成为两方争执之点也”<sup>[5]</sup>。

湖北省长一职原为湖北督军王占元所兼任<sup>[6]</sup>。自中央主倡军民分治,各省闻风而动。为迎合中央

[1]民国成立至1914年7月以前,省最高军政长官称都督,其军政机关称都督府。1914年7月至1916年期间,省最高军政长官改称将军,其军政机关改称将军府及将军行署。1916年7月至1924年12月期间,省最高军政长官称督军,其军政机关称督军公署。1924年12月至1928年12月,省最高军政长官有的省区由督军改称督办,军政机关相应改称为督办某省军备善后事宜公署。

[2]主要代表性论著有: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朱英《民国时期省议会与省长之间的冲突——以江苏省议会弹劾省长案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丁旭光《变革与激荡——民国初期广东省政府(1912-1925)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刘迪相《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省区军政体制研究》(湖南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郭从杰、李良玉《1921年安徽省长人选政潮探析》(《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霍龙飞《1920年苏鄂两省省长更迭风波》(《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4期)。

[3]陈志让:《军绅政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1页。

[4]《我希望反对湖北省长的人进一步主张民选》(1920年9月14日),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民国初期史料(1912-1928)》,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页。

[5]《省长问题》,《申报》,1920年9月5日,第1张第3版。

[6]湖北省民政长官初为巡按使,由范守佑担任。自黎元洪担任大总统后,将巡按使改为省长。1916年7月21日范守佑病逝,王占元便兼任省长。

政策以及受“鄂人治鄂”浪潮影响,湖北督军王占元保荐何佩瑢<sup>[1]</sup>为省长,“一则抵制中央简放无关系之人,二则以何为鄂人,为将来卸责之余地”<sup>[2]</sup>。同时何佩瑢也深为王所信任,据朱峙三日记记载,“何前为王占元之参谋长,累迁要职,如湖北财政厅,大发鄂人之财。又以贪污费多给王,以固其宠”<sup>[3]</sup>。但何氏终究是鄂籍省长,并非鲁籍省长,直系曹锟与奉系张作霖以“何投身安系,且有借给郑万瞻六十万巨款之谬举,非免职示惩不可”<sup>[4]</sup>,加之何氏又“性近圆通,凡人拜托一事,均不能切实办到,以致昔人同僚、京中大佬均非议之”<sup>[5]</sup>,于是王占元去何而力保孙振家为湖北省长。孙振家系山东临清人,孝廉出身,早年入日本法政大学,归国后曾任直隶省正定知府,因案被免职。1913年在农商部任实业司主任,因家富,与王占元攀为姻娅。1915年到湖北担任王的秘书,后任湖北官钱局局长。1918年署湖北荆南道道尹,毫无政绩,且年已逾六旬。北京政府因孙振家是“王督军所保,未经阁议讨论”,遂于1920年8月30日任命其为湖北省长。

该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鄂人强烈反对。“凡鄂人之稍有知识者,无不认此事为有切肤关系”<sup>[6]</sup>。孙振家任职省长之所以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主要缘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就其履历而言,“莅鄂数年,政绩毫无所表现”,其一切行政上之方针,多效仿王占元督鄂时期的政策,“决无若何之改建”。第二,正值实行军民分治与自治之风盛行之时,孙振家并非民选省长,而属王占元个人之意。且孙属于鲁人,也不符合鄂人治鄂之说。第三,反孙即是反王。王占元督鄂数年,部分鄂人已多有不满,拟借此次事件达驱王之目的。

湖北旅京同乡会闻讯,随即召开会议,并派代表谒见国务总理靳云鹏,“请收回成命,阻孙到任”。9月4日,又特派副会长夏寿康及干事孔庚、饶汉秘等赴津,与鄂籍要人黎元洪、周树模两公磋商办法。“黎是退职的大总统,周是总统徐世昌的同年,徐任东三省总督时,周为黑龙江巡抚”<sup>[7]</sup>,二人私交颇深。黎与周此时虽已下野,但对北京政府内政的形成和走向,特别是对湖北政策的制定、人事安排具有一定的影响力<sup>[8]</sup>。民心如此激昂,黎、周二人不赞成孙为省长。然而孙振家已于该日抵达武昌,并定于10日接印。

9月5日,旅京同乡在湖广会馆开会,到者千余人,人数之多,为历来同乡会所未有之景象,足见湖北旅京同乡对于此事的重视。大会决定“以鄂人治鄂,主张废督,以期树民治之基础”,并“推定代表向政府轮流请愿”<sup>[9]</sup>。

王占元自收到旅京同乡会电文后,知輿情难拂,遂于5日复电旅京同乡会,表示“鄂省军民分治,

[1]何佩瑢,字韵珊,湖北建始人。早年入湖北自强学堂,后被选送日本,初入振武学校,后入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曾任清陆军部少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官、陆军第二镇正参谋官等职。1912年先后任第二师参谋长、湖北督军参谋长等职,曾被授予陆军上将衔。因获湖北督军王占元信任,1917年任湖北省政务厅长、财政厅长,1919年任湖北省省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武汉参议会参议长、武汉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选择投敌,1942年被日军毒杀。

[2]刘挫坐编:《鄂州惨记》,交通印书馆1922年版,第6页。

[3]朱峙三:《朱峙三日记》第四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4]《鄂省长更动之裏面观》,《申报》,1920年9月1日,第2张第7版。

[5]《湖北政海波澜纪》,《时报》,1920年9月7日,第2张第3版。

[6]《鄂省会反对新省长之坚决》,《申报》,1920年9月14日,第2张第7版。

[7]卢蔚干:《北洋时期湖北的省长更迭及“鄂人治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北文史集萃·政治·军事》(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8]田子渝:《武汉五四运动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

[9]《鄂人昨日同乡大会》,《顺天时报》,1920年9月6日,第3版。

已逾年余。孙氏被任省长,系属中央权衡,能否收回成命,希诸君直向政府相恳,督军未便干涉”<sup>[1]</sup>,可见王占元对于撤孙的态度是模糊的,并将责任推卸于中央。府院方面“睹此情势,未必不自知鲁莽”,却已陷于两难之境地。一方面,王占元出于自身考虑,“不能不保障其业成事实之省长亲家,使政府无从转变”;另一方面孙振家长鄂令已经发表,若“因鄂人反对,遽尔收回”,中央威信将何在。于是,府院令人托黎元洪疏解,“以徐图转圜之时间”,而黎元洪则“推荐鄂籍三人以代孙氏,政府又无以答复,两方正成相持之局”<sup>[2]</sup>。此时,孙振家就职之电又到,显示王占元之意无可挽回,故中央之处境愈发尴尬。

与此同时,湖北省议会对于孙振家掌鄂一事也表示反对。9月6日,省议会召集紧急茶话会,一致主张不承认孙振家为省长,电请中央政府收回成命,并“函请王督俯顺舆情,转饬孙氏勿庸到任”,另还“致函各团体请一致反对”<sup>[3]</sup>。9月9日,省议会再次召开会议,议定孙振家接任后,公文一概拒收。同时省议会又致电中央,表示“孙道定于十日接印,人心愈形惶惑,时机已迫,迅恳政府收回成命,以安人心”<sup>[4]</sup>。在此期间,武汉学生联合会等湖北各团体也均表示反对。

然而孙振家“自恃有军阀姻娅势力”庇护,仍在一片反对声中于10日接省长印。这一举动无疑导致了“倒孙运动”的加剧。此时省议会又召集茶话会,商议“一面通电旅居各省之湖北同乡全体反对外,一面由本会公举代表议员数人入京会同请愿”<sup>[5]</sup>。北京政府鉴于湖北连日来反对孙振家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得不派人赴天津与黎元洪、周树模磋商调停意见。黎元洪认为“政府如欲调息此次风潮,须将孙振家免职,以平息全体国民之公愤”<sup>[6]</sup>。

随着鄂人“倒孙运动”日益激烈,势必牵及王占元,“声言王如不从民意,将进而为倒督运动”<sup>[7]</sup>。如旅沪鄂人各界人士发起组织旅沪湖北自治协会,“一致主张根本解决,废督驱王”,将矛头直指王占元。王占元见形势不妙,一面电恳曹锟为孙振家疏通,被曹拒绝;又派官矿局总办金鼎赴津,并亲笔致信黎元洪和周树模,请代孙氏疏通,但也被黎、周二明确拒绝。

9月15日,湖北京津人士在天津召开紧急会议,旅京同乡会派代表孔庚、吕逵先等五人列席外,旅津鄂省重要人物全体到会。首先由汤芑铭“述明曹、张二使及吴佩孚对此问题之态度”<sup>[8]</sup>,继由黎元洪、周树模等人发言,无不认为“此次之行动实系出于全体鄂人之公意,无论何人均不能违反舆情”。16日,旅京同乡会又在湖广会馆开代表谈话会,首由湖北各界派京之代表韩英华报告武汉各方之情形,随后大会议决:(一)质问政府,何故延不答复;(二)再电省议会“请坚持到底,并从速提出查办案”<sup>[9]</sup>;(三)在同乡会内设立研究地方自治法团体;(四)联络湖北各界;(五)靳总理“如无相当答复,再见总统与国务员”;(六)联络各省旅京同乡会,以谋协力促成民治之计;(七)派人分谒曹锟、李纯、吴佩孚等;(八)调查王占元劣迹,以便正式提起诉讼等十项办法。会后旅京同乡会向总理靳云鹏“正式质问前所承认之转圜之办法”<sup>[10]</sup>。

[1]《王占元力庇孙振家》,《民国日报》,1920年9月11日,第2张第6版。

[2]朴:《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9月15日,第2张第6版。

[3]《鄂人反对孙振家之急进》,《申报》,1920年9月10日,第2张第6版。

[4]《湖北省议会反对孙振家长鄂电》(1920年9月9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五》,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

[5]《议会与孙振家》,《民国日报》,1920年9月18日,第2张第6版。

[6]《鄂人意中之省长资格》,《民国日报》,1920年9月12日,第2张第6版。

[7]《专电》,《申报》1920年9月14日,第2张第6版。

[8]《京津鄂人之自治运动》,《民国日报》,1920年9月19日,第2张第7版。

[9]《鄂人连日之津京会议》,《顺天时报》,1920年9月17日,第3版。

[10]《鄂人驱孙风潮之扩大》,《民国日报》,1920年9月20日,第3张第6版。

中央政府迫于各方压力,于9月18日下令免去孙振家省长职务,并“任命鄂人夏寿康为湖北省长”<sup>[1]</sup>,同时为顾全王占元的面子,任命孙振家为京兆尹。夏寿康系湖北黄冈人,前清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与黎元洪关系密切,黎主鄂时,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议、湖北内务司司长、民政长。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夏出任总统府秘书长,不久专任平政院院长。之所以任命夏为省长,一方面出于黎元洪之推荐,另一方面夏寿康符合鄂人治鄂之标准,且有曾在湖北履职之经历,深为鄂人所拥戴。

概括孙氏被调之原因,计有五点:(一)黎元洪出面反对,王占元“不便拂逆”。(二)吴佩孚曾电王占元,劝其勿违反鄂人公意。(三)鄂人决议“如驱孙不成,则将进一步倒王运动”。(四)鄂西形势变化,蓝天蔚等又藉此问题以谋活动。(五)孙振家亦恐“不能坚持,早谋他调”<sup>[2]</sup>。有此以上五因,中央政府不得不“鉴于鄂省四周之空气,不待王占元之同意,调孙振家为京兆尹,特任夏寿康为湖北省长”<sup>[3]</sup>。

## 二、围绕夏寿康赴任之各方博弈

中央政府任命新省长之后,并未根本解决省长人选政潮,湖北督军王占元与中央以及鄂省各界又围绕新省长赴任展开了博弈,使此次纷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当夏寿康掌鄂命令发布后,湖北各界异常欢欣,省议会、学界、商会以及绅耆纷纷致电表示欢迎,而王占元却因“夏氏为反对孙振家最力之一人”<sup>[4]</sup>,遂于9月20日通电中央,表示反对夏寿康到任。王占元之有此举似乎无需解释,自其督鄂以来,“如天之骄子”,从未受如此挫折,“颜面攸关,况系撤换其亲家省长”<sup>[5]</sup>,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夏寿康本人对于湖北省长一职,“因系反对孙振家最烈者,深恐接任后,王占元与本身为难”<sup>[6]</sup>,于是提出“须鄂省实行军民分治,方愿到省长任”<sup>[7]</sup>。不久王占元再次电京表示反对,湖北军界鲁籍军官如孙传芳、寇英杰等也来电反对,且措词激昂。鉴于形势,夏寿康以“鄂事棘手,自揣才力,不足胜任”为由,正式向中央呈请免去湖北省长一职。随后,又赴津谒见黎元洪、周树模,说明不能就任之理由,而黎、周二则苦劝夏上任,同时周树模也赴京谒见徐世昌总统,要求中央给予夏以相当之支持。中央方面接到王占元和夏寿康电文后,感到左右为难。为维持中央之威信,徐世昌总统召见夏寿康,“嘱以勿辞,促其赴任”,并致电王占元竭诚接洽。9月23日,国务总理靳云鹏派人赴鄂,希望疏通王占元,请勿再反对夏寿康。

京津鄂人闻讯也召开紧急会议,一致主张一面敦劝夏氏毋庸辞职,一面实现军民分治之精神,收回省长固有之权限。随后,湖北旅京同乡会又特派“卢复回武汉联络各民众团体,发起欢迎夏寿康省长到任的活动”<sup>[8]</sup>。王占元前虽“表示反对之意,而今鉴于鄂人之声势汹涌,乃密令其秘书金世和来电表示欢迎”<sup>[9]</sup>,并在表面上也改变态度,亲自致电夏氏,表示希望其迅速莅任,声称“系省署范围事务,决不干涉”<sup>[10]</sup>。同时还派金鼎赴津晋谒黎元洪,表示欢迎夏氏就任。基于上述种种情形,夏氏以为王占元态度已缓和,决心赴任。至此,省长问题似已完全解决。

[1]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69页。

[2]《鄂省长问题已告结束》,《申报》,1920年9月23日,第2张第7版。

[3]刘揆尘编:《鄂州惨记》,交通印书馆1922年版,第9页。

[4]《省长风潮之激荡》,《民国日报》,1920年9月22日,第1张第6版。

[5]刘揆尘编:《鄂州惨记》,交通印书馆1922年版,第10页。

[6]《更动大吏之经过》,《申报》,1920年9月22日,第2张第6版。

[7]《专电》,《申报》,1920年9月21日,第1张第3版。

[8]丁地树:《施洋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9]《鄂人治鄂运动之效果》,《申报》,1920年9月28日,第2张第6版。

[10]《鄂省政潮之近闻》,《申报》,1920年10月10日,第2张第7版。

然而9月28日,王占元突然向中央请假一月。29日,王占元又续电请假,特派程汉卿来京声明,“请假非由省长问题,对夏寿康已表示欢迎”。中央政府对于王占元请假一事当然不准,一面复电慰留,一面派人赴鄂疏通。其实王占元此举实际是对夏寿康明迎暗拒。王并不反对夏寿康担任省长,只因夏氏遵从鄂民意,主张实行鄂人自治,自治之方针无疑与王占元督鄂原则与利益相违背,也必然引起王占元莫大反感,故以请假为手段向中央施压。10月19日,王占元又派陆军审判处长程定远赴津,向黎元洪、周树模陈述“对于新省长用人行政的意见”<sup>[1]</sup>。

由于王占元明里暗里始终反对夏寿康就任,致使夏迟迟不能出京。29日,旅京同乡会在湖广会馆开会,各代表决议致函靳云鹏总理,质问中央威信何在,并拟以王占元“纵兵殃国”、“违抗中央命令”、“迫索民财”等罪状宣传全国。11月1日,鄂省各县代表又在湖广会馆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推举代表,前往府院质问政府,并敦促夏省长本人。会后,代表十二人赴总理府请愿,询问政府“既已任命夏为省长,何以又令其缓行,中央对王占元既疏而不通,是否即王占元违抗中央命令之表现”。靳则称:“中央当始终服从民意,立即使夏省长到任。同时,为维持中央威信起见,亦不能不使此命有效,惟须宽缓数日之时间,自有办法。”<sup>[2]</sup>随后代表又至夏寿康住处,敦促夏氏早日到任。夏寿康表示将尽快向当局辞行,“如政府无阻止起程之语,再毅然前往”。7日,夏寿康正式宣布将于11日赴鄂。

11月9日,王占元忽然又电中央,以鄂省“财政奇绌,焦灼成疾”为由请假一月,督署事务委派参谋长方日中代行职务。王在致友人电中则表示:“内阁此次任命省长,予人难堪,夏省长到时,恕不接待,嗣后积欠军饷,地方秩序,均由内阁与新省长担任,占元概不过问。”<sup>[3]</sup>显而易见,王占元屡屡请假,乃是挟迫中央,反对靳总理,拒绝夏氏到任的一种阴柔方式。中央政府主事者对此心知肚明,故而当11日夏氏向府院辞行,并“询以各方面情势是否至水乳交融程度”<sup>[4]</sup>,府院则要求夏氏暂缓履任。夏也明白“情势尚有隔阂”,于是11日赴任之计划又不得不延期。旅京鄂人闻此种消息后,异常愤激。

王占元如此跋扈,鄂人又愤激万分,此时已经失去信用的中央政府亦不能置之不理,故除托王士珍、田文烈等人竭力疏通外,又派王芝祥赴鄂,劝告王占元取消请假,并为省长问题与王疏通。经过王芝祥与王占元协商,加以“王、田两氏来电恭维,请勿使总理为难,王不便过于坚拒”<sup>[5]</sup>,最终答应销假,并承认夏出任省长,但仍说“惟鲁籍各军人反对仍烈,希望夏暂缓就任”。

在此之前,夏寿康因王占元“反对态度日益坚决,且以去就力争,若冒然就任,恐引起意外风波”<sup>[6]</sup>,不得不再次赴天津与黎元洪商议办法。黎言:“民意所归,未便违拗,应早束装入鄂以慰民望。至军阀之反对,原在意中。军阀之强势,仅在一时,与民意相争持,终败于民意也。”<sup>[7]</sup>得到黎氏建议后,夏氏于16日下午返回北京,决定于二三日内冒险赴任,如为王所不容,再行辞职。而徐世昌总统“犹恐又有变动,乃特召长江一带密查长米材栋,命其先行赴鄂,为夏省长之前站,向王使再行说明一切,以保证夏寿康可安全到任”<sup>[8]</sup>。

11月19日,黎元洪通电表示夏寿康再不赴任,惟有绝交。夏寿康迫于压力,决定于21日赴任。

[1]《许可省长履任后之王占元》,《晨报》,1920年10月22日,第2版。

[2]《旅京鄂人之示威运动》,《申报》,1920年11月5日,第2张第7版。

[3]《王占元请假内幕》,《顺天时报》,1920年11月11日,第2版。

[4]《夏省长缓来之原因》,《汉口中西报》,1920年11月14日,第3张。

[5]《鄂省长问题之波折》,《申报》,1920年11月18日,第2张第6版。

[6]《夏寿康乞灵于黎菩萨》,《民国日报》,1920年11月15日,第2张第6版。

[7]《夏寿康决定冒险赴任》,《晨报》,1920年11月17日,第3版。

[8]《夏寿康赴任之委婉曲折》,《晨报》,1920年11月20日,第3版。

从夏寿康角度来看,其不想赴任除个人原因外,还在于旅京鄂人主张鄂人自治运动,对于鄂省事务主张根本改革,“所有政务、财政、实业、教育各厅,皆应易鄂人,以符本省人办本省事之实际”<sup>[1]</sup>,夏寿康如果进行彻底之改革,则必然“引起王督方面之反感”,而夏氏如果只是“事事敷衍,甘为何佩镕第二,则与鄂人拥夏上台之目的相背驰”。可见,此时的夏寿康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最终,夏寿康“碍于黄陂、少朴之谆谆劝勉,及孔吕两代表力述北京同乡敦劝之意,加以武汉各界连日欢迎之电报纷纷驰至”<sup>[2]</sup>,且认为“纵不以省长资格,而以乡绅资格回鄂,王亦不能不容予安住武昌”<sup>[3]</sup>,于是不得以而赴任。

22日,夏寿康抵达汉口大智门车站,迎接场面盛况空前,“总计欢迎人数,除王占元、孙振家未派代表外,其他军政警各界,或亲莅站,或派代表,约在五六千人以上,摩肩擦背,很为拥挤”<sup>[4]</sup>。“此为汉口仅见之事,唯满清时代,汤化龙赴京争辩铁路,曾有此盛况,此则第二次也”<sup>[5]</sup>。

综上所述,围绕夏寿康就任省长一职,湖北督军王占元因恐夏氏执政方针与本身统治所不利,一直以请假为理由,反对夏赴鄂就任,致使夏寿康在京滞留65天之久,也使中央威信尽失。当时即有舆论评论道:“鄂省长命令发布已月余,迄未莅任,中央命令之效力已等于零。”<sup>[6]</sup>由此可知当时中央政府权力之衰微。尽管如此,中央最终还是屈从民意积极促成夏氏南下赴任。

王占元之所以屡次反对夏寿康接任,综其原因,大约有三:其一,“欲使孙振家担任省长三月”。王占元虽不能为其亲家保留省长头衔,亦当使“亲家受为省长之实益,以三月为限,当不虚此一任也”<sup>[7]</sup>。其二,夏寿康执政之方针引起王占元“莫大反感”。一部分与夏寿康接近的鄂人,大唱高调。有主张夏莅任,宜“带鄂人某师长的军队入鄂,编作警备队,以备日后不时之需”<sup>[8]</sup>;有主张鄂省现任各厅道一律改换鄂人,这些言论无疑引起王的反感:“虑夏到任以后,全用鄂人,若辈全失其饭碗。”<sup>[9]</sup>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王采取“先发制人之计”,屡次电京反对夏寿康到任。其三,湖北官界内部也出现分裂。自中央明令夏寿康为湖北省省长后,督军省长两署的办事人员分为两派,即山东派和非山东派。“山东派以鄂军第一师师长孙传芳、督军公署秘书孙百福为代表”,主张采取强硬态度;“非山东派以省长公署秘书长金世和以及金鼎为代表”<sup>[10]</sup>,主张顺应中央,欢迎夏寿康。两派中又以山东派为主导,该派多次怂恿王占元对抗中央,王深受影响,故致夏迟迟不能到任。

### 三、兵围省署事件及其影响

屡经周折的夏寿康抵鄂之后,虽然受到湖北各界的热烈欢迎,但同样并不意味着这场围绕省长人选的政潮即到此结束。王占元随即又采取辞职的方式予以反击,造成湖北地方社会人心恐慌与动荡,接着发生兵围省署事件,致使这场省长人选政潮一波三折,影响日益扩大,难以平息。

夏寿康于22日抵汉后,寓于都府堤柯逢时旧宅。王占元一面派督署卫队两连前往保护,名为保护,实为监视,一面以军队军饷问题和生病为由再向中央提出辞职。兹闻王氏电请辞职,鄂省各界“谣

[1]《夏寿康迟迟赴鄂之原因》,《申报》,1920年10月22日,第2张第6版。

[2]《鄂人自治决心之胜利》,《民国日报》,1920年9月28日,第2张第6版。

[3]《鄂新省长就任之反响》,《申报》,1920年11月28日,第2张第6版。

[4]《夏寿康到鄂时之人心与官态》,《晨报》,1920年11月25日,第3版。

[5]刘控尘编:《鄂州惨记》,交通印书馆,1922年,第11页。

[6]《命令之效力》,《顺天时报》,1920年11月13日,第3版。

[7]《鄂王拒夏留孙之内幕》,《民国日报》,1920年11月7日,第1张第3版。

[8]《一波三折的省长问题》,《晨报》,1920年11月19日,第3版。

[9]般若:《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11月24日,第2张第6版。

[10]《王占元请假之内幕》,《民国日报》,1920年10月12日,第2张第6版。

逐纷纭,人心惶惶”。此时鄂人处于两难境地,既对王占元多有不满,又担心王如辞职,出现混乱局面,地方不靖,反受他种伤害。省议会召开紧急茶话会,多主张以秩序为重,电京挽留,以安人心。武汉两商会因王督辞职,恐引起市面恐慌,金融紧迫,为避免造成重大商业损失,亦表示挽留。武汉其他各团体同时也纷纷电京慰留。中央自王氏电文后,乃复电劝其打消辞意。总统徐世昌恐王占元坚辞,“特派侍从武官刘宗纪会同鄂财政厅长郭干卿同往武昌,传达中央意旨”<sup>[1]</sup>。其实王占元称病辞职,不过以恐吓手段威胁政府与鄂人,“此乃督军之一种惯技”<sup>[2]</sup>,在事实上决难实现。现在“一片慰留声又嚣然而起,政府又加疏通,王或可从此下台”,由此使王占元已于形势上占据主动。然而,接下来突发的兵围省署事件又使鄂省局势突变。

23日,督署实行特别戒严,省长公署也加调军警,改发徽章,市民异常惶恐。该日下午,孙传芳派部下第二师第七团第一营军队突然包围夏寿康住处,并有军界代表王铸民,声言要见夏省长,于是夏省长派饶凤璜接见。该代表声称有公函要面交省长,非见夏氏本人不可。饶见其气势汹汹,再三婉劝,并称可全权代表夏省长。王遂提出二项条件:第一,致电政府慰留王督;第二,要求夏氏暂缓接任。随后又将第二师师长孙传芳之公函递交饶凤璜。该函大意与王某所言略同,夏寿康因恐惊扰市民,当即承认各项条件。王铸民随后而退,但军队却仍不肯去,经杜锡钧镇守使、省议会会长屈佩兰等再三疏通,至天亮时军队才退去。24日清晨,夏藉以拜客为名“渡江驻汉,以避兵锋”,同时“一面电呈中央,并派人驰赴京津,将当日被胁情形面呈”<sup>[3]</sup>。

此次事件系王占元部下以孙传芳为首的鲁籍军官谋划,其缘由一则出于对中央政令的不满,二则对夏氏执政方针之不满。另外孙传芳乃孙振家之侄,此次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私人报复目的。自己手下军官派兵包围省署,使矛盾冲突趋于激化,王占元当然也难脱干系,湖北各界普遍认为是王在背后指使,孙才敢于有此行动。

孙传芳兵逼夏寿康消息传出后,湖北各界义愤填膺,誓与王占元决一胜负,“对于孙传芳之逼迫行为,也持非依法处分不可之态度”<sup>[4]</sup>。“省议会及汉口商会暨各团体,因顾全湖北人体面起见,业已分途作猛力之活动”。湖北自治运动同志会则表示此次事件已是军阀与民治主义宣战的第一幕,并提出四项宣言:(一)希望湖北省议会立即正式追举夏寿康为湖北省长,以符合民治之精神;(二)希望夏氏不屈不挠,继续与军阀抗争;(三)希望夏氏正式接任后,充分采用民治精神的政治;(四)希望与其他团体一致行动,共同扫除自治障碍<sup>[5]</sup>。

官厅方面,“因愤于孙传芳贻害夏寿康之行为,纷纷辞职,逃出武昌者,亦有数十人之多”。湖北军界内部甚至也因此出现分裂,“王懋赏、刘佐龙、杜锡圭等均愤恨王占元误听孙传芳之言,而与鄂人全体结怨”<sup>[6]</sup>,且此次之举动,显系“变相的宣布独立”,所以也表示反对态度。除王、刘外,张敬汤、吴光新等部也表示反对。

京津方面,鄂人尤为激愤,均视王占元此举,实为反抗中央权力之行为,均主张罢免王占元。旅京同乡会于27日上午在湖广会馆召开全体代表大会,会议议决三项内容:(一)推定代表二十二人到府

[1]《王占元之辞职与挽留》,《晨报》,1920年11月26日,第2版。

[2]《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11月28日,第2张第6版。

[3]《抄呈夏寿康接任鄂省长受阻函》(1920年11月30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五》,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4]《夏寿康在汉口就职》,《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日,第2张第6版。

[5]《自治运动同志会与鄂省长》,《晨报》,1920年12月1日,第3版。

[6]《夏寿康被围逃汉详情》,《申报》,1920年11月29日,第2张第6版。



院谒见总统、总理,质问中央能否保证夏氏就职,能否保证鄂省治安;(二)派代表若干赴津质问黎元洪,前此促夏赴任,曾声言愿为后盾,现究以何办法应付;(三)搜罗并宣布王占元督鄂之罪状。随后,湖北同乡会又电中央政府,质问政府“省长与督军立于对等地位,省长到任,应否由督军许可;领兵将吏,应否干涉民政;特任大员,应否受军人胁迫;军队专恣暴动,督军应否负责”<sup>[1]</sup>。

至此,围绕湖北省省长人选政潮风波的影响已及于全国,引起全国各界关注。各省区对此一事件也纷纷发电质问,尤以各省自治团体所来之电最为激烈。其大意谓:“值此自治明令初颁,民治声浪正高之日,决不容军人有此违法背命之举动。”<sup>[2]</sup>全国舆论一致认为夏寿康为中央任命之官吏,而“受此大辱,实非夏氏私人之辱,乃中央之辱,全国人民之辱。军队本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今孙军演此谬举,已目无中央”<sup>[3]</sup>。各方一致要求严惩孙传芳,并将矛头对准王占元。适此,王占元“已愈陷于自杀之地位”,在形势上愈发处于不利局面。另外,旅沪鄂人也召开旅沪湖北公民大会并致电中央,要求“中央维持威信,速电王督上奉命令,下顾民情”<sup>[4]</sup>。

自接到湖北新任省长被军队胁迫的消息后,府院当局极为焦灼,以孙传芳此种暴动,显然系故意与现内阁为难。故总理靳云鹏有“最严厉最关切之电”立致王占元,表达了较强硬之态度。此后中央又向鄂人提出三点保证:(一)中央既下命令,为维持政府威信,必使夏省长到任。(二)政府以保持人民治安为天职,对于鄂省人民治安当然负完全责任。(三)总理已早有夏不到任,则与夏同时下野之宣言。此次之事,中央当始终顺从鄂省民意,使鄂人得圆满之结果<sup>[5]</sup>。鉴于鄂省长问题,形势日益紧迫,北京政府认为此事与时局有重大关系,特由靳云鹏总理亲自电请曹锟和张作霖出任调停之责。自直皖战争后,徐世昌总统和曹锟、张作霖曾达成某种协议,“中央如有重大事件共助办理”<sup>[6]</sup>。曹派师长王承斌,张派副司令秦华来鄂,调解鄂省长风潮。“一面劝慰王占元毋庸辞职,一面与孙传芳最严厉之告诫。”<sup>[7]</sup>

上述情形表明,湖北省省长人选政潮已经从一省问题变为全国性的重大问题。王占元的善后措施是否得当,将直接影响时局走势。王占元作为孙传芳的直属上司,与此次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鉴于中央的强硬态度和来自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王占元不得不屈从民意,其态度亦开始软化,回电中央表示已将中央意见晓谕湖北各师旅,并欢迎夏氏接任,并派孙保滋入京面陈一切。随后,王又特于26日深夜召集军政两界重要人士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于27日正午在武昌省署迎接夏寿康,举行正式就任省长之职。夏寿康出于安全考虑,坚持不赴武昌办公,孙振家遂派人将省长印信送至汉口,夏寿康当即接印视事。自此省长就任问题才告结束。

#### 四、省署移汉之争

虽然省长就任纷争已结束,但随后又发生省署移汉之争,成为此次省长人选政潮的余波。湖北素以武昌为省会,考之历史,由来已久,“设官建署,盖已有数千年之经营,为鄂中行政之集中地点”<sup>[8]</sup>。夏

[1]《湖北旅京同乡会揭发鄂督王占元指使所部孙传芳以武力阻止夏寿康接省长印电》(1920年12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2]《夏寿康在汉口就职》,《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日,第2张第6版。

[3]直言:《北京通信》,《申报》,1920年12月2日,第2张第6版。

[4]李新主编:《中国民国史·大事记》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09-1310页。

[5]《鄂省长问题之面面观》,《申报》,1920年11月30日,第2张第6版。

[6]《曹张对于中央之条件》,《香港华字日报》,1920年9月3日,第3张第1页。

[7]《夏寿康在汉口就职》,《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日,第2张第6版。

[8]《省署驻汉又一研究》,《公论日报》,1920年12月4日,第3张第5页。

寿康自接印后,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防止受王占元牵制,不愿与军署同城,决定暂借督办汉口商场建筑处为省长行署,并委托饶凤璜为秘书长,罗琢章等为秘书,沈泽生为政务厅长。不仅如此,夏氏为自保,乃行使其省长职权,派万耀煌前往黄梅一带招募警备队员,成立省长公署警备队。另外,夏氏还专电中央及分函旅京鄂籍要人,说明省署移汉的情形。

自夏氏设省署于汉口后,各方实际有三种态度。第一种反对移汉,以王占元、武汉两商会为主。王认为“武汉之拥夏者众,旅京鄂人之倒督运动,益力知夏不返省,双方猜忌不能悉泯”<sup>[1]</sup>,乃函促夏来省视事。夏接王函后,以生病为托词而拒绝。王又以“湖北军署同城,历来如是,何以骤为分驻”<sup>[2]</sup>为由,极力要求省署仍设武昌,并电请北京政府催促夏寿康“速返武昌省署办事,以便互相为助,共策进行”。武昌、汉口两商会也“主张夏省长回武昌省署”<sup>[3]</sup>。且“武汉三埠自夏省长被迫改就汉口商场督办办公处接印视事以来,谣言纷起,武昌及汉口居民迁入租界住家者,箱笼家具,络绎于途,恐慌情形,一若大乱之将至”<sup>[4]</sup>,致使市面动摇,商业大受影响,故商会人士也希望夏省长早日回武昌省署办公,以稳定鄂省政局。第二种主张省署移汉,以旅京鄂人最力。旅京同乡会表示“政府无处分孙传芳办法以前,暂设省署于汉口”<sup>[5]</sup>,并嘱其勿赴武昌,以免受军人之牵制,而立军民分治之精神;甚至有代表“主张援引安徽先例,省长与督军分驻两地为宜,而提议永久以汉口为省会”<sup>[6]</sup>。黎元洪与周树模等也支持夏寿康在汉口中国管辖地设立行署。其理由有二:一则“王占元既无统一部下之能力,中央又无惩罚孙传芳之办法,夏省长不但为中央命官,且为吾乡长者,岂堪一辱再辱,故在中央无力处分孙传芳以前,夏省长当然不能冒然移驻武昌。”<sup>[7]</sup>二则“值此中央提倡军民分治,各省主张民治声浪日益高涨之时,此次孙传芳逼迫夏省长渡江,夏已在汉口接印,实为鄂省军民两长分驻之天然机会”。此外,报界方面对于省署移汉也极度赞成,“均以汉口地华洋杂处,人烟稠密,在汉组织省署,较之武昌适宜实多,故极望赞成其成为事实也”<sup>[8]</sup>。第三种则持观望态度。鄂省各团体除武汉两商会外,都持观望态度。省议会方面对于此事“并无若何之意见发抒,多数主张顺应民意”,所以也持观望态度。

上述观点中,又以第二种态度为主流,但这三种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此后湖北各界联合会、湖北平民教育社等湖北地方各团体态度转变,发电夏寿康,盼望夏氏早日将省署移汉;湖北省议会的态度则出现分歧,一部分议员支持省署移汉,一部分议员则被王占元收买,反对省署移汉。

王占元方面鉴于“鄂人态度之强硬,而夏又有暂就汉口为省署所在地之意,反觉把持民政之计划失败”<sup>[9]</sup>,28日派省议会议长屈佩兰及财政厅长魏联芳等先后渡汉,请求夏氏移驻武昌。夏则言:“军人跋扈如斯,寿康忝为中央命官,岂堪再辱,决计孙传芳一日不离鄂,则省长一日不渡江。”<sup>[10]</sup>可见夏寿康不赴武昌的态度之坚决。中央自收到夏寿康电文后,经过阁议,极力主张夏氏“从速渡江”,并误认为特别区域为租界,于是“用万急电报,催促夏氏,即日驰赴武昌”<sup>[11]</sup>。夏寿夏乃复电中央,并派秘书罗

[1]《夏寿康就任后之态度》,《申报》,1920年12月4日,第2张第8版。

[2]《省长迁治问题之武昌方面》,《公论日报》,1920年12月4日,第3张第5页。

[3]《省长潮中之鄂省署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12月5日,第2张第6版。

[4]《武汉之风鹤惊》,《申报》,1920年12月15日,第2张第6版。

[5]《鄂人紧急会议之内容》,《顺天时报》,1920年12月4日,第2版。

[6]《夏寿康在汉口就职》,《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日,第2张第6版。

[7]《周树模之湖北省治谈》,《晨报》,1920年12月4日,第6版。

[8]《省长潮中之鄂省署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12月5日,第2张第6版。

[9]《鄂省署决暂设汉口》,《民国日报》,1920年12月2日,第2张第6版。

[10]《鄂省长问题与各方面》,《晨报》,1920年11月30日,第2版。

[11]《鄂省长驻在地之争执》,《晨报》,1920年12月3日,第3版。

琢璋北上向中央说明不能渡江之理由。12月2日,中央又派步军统领王怀庆南下,调和湖北政事。王怀庆此次南下任务之一,即是“催促夏省长,抛去疑虚,不再滞汉,移省垣办公”<sup>[1]</sup>,而夏寿康则仍坚请省署移设汉口,因“夏氏总不放心,决意非有确实把握,断不轻易返省”<sup>[2]</sup>。

王占元自知夏意已坚定,非空言可以恐吓之,但又不愿就此作罢,于是一方面拒绝夏氏拨给省署警备队枪弹的请求,另一方面发动议员向夏提出质疑。当以武力排斥夏寿康失败后,王占元即以金钱和保证下届当选为条件,四处收买省议会议员,于是一般见钱眼开者趋之若鹜,被收买的议员达50人之多。后为掩人耳目,又在省垣阅马场附近楚善公所内组织机关,其目的纯为拒夏。现在发生省署驻地问题,该组织议员陈绍龙等十余人便向夏提出质疑,此后杨伯焘议员再次提出质问,且较前次更为激烈。另外,该组织议员又联合电京,催促夏氏返省。

王占元见有一部分议员为他奔走,态度又稍变强硬,除电京反对省署移汉,派何佩瑛“劝京津鄂人不必为此主张”<sup>[3]</sup>外,特邀省议会两副议会长、武汉两商会会长,向夏“为最末次的催促”,并警告“如再拒绝,只有暂不过问,以待中央的后命”<sup>[4]</sup>。至此,省署问题依然在僵持状态中,中央政府“因徇王督意思,迭电催夏返省”,而鄂人方面则恐夏省长返省,“必无法避王之牵制,群起阻之”。夏寿康进退两难,故特请病假,以待“全鄂人民之自决”。

自孙传芳兵逼夏寿康后,不独鄂人激愤,全国舆论亦颇反感,势非惩办孙传芳不可。夏寿康亦宣称非惩办孙传芳,决不移署武昌。中央政府鉴此情形,恐酿成大变,也曾特电王占元详复查办。王占元自知“既不理于众口,乃为宜昌兵变善后需人为词”,于19日将孙传芳调赴宜昌,“一以搪塞中央之命令,一以恢复夏氏之感情”<sup>[5]</sup>。随后王特致函夏寿康,谓“孙传芳已调宜,请其查照,务速回署,以息谣逐”<sup>[6]</sup>。孙传芳的调离无疑为夏返省提供了可能。王占元还派财政厅魏联芳“谒夏劝驾,意以此或可转圆夏氏之态度”<sup>[7]</sup>,故夏寿康的态度逐渐缓解。鄂人方面则认为“移驻问题,为鄂人生死关键者”,“民治初基,端在分驻,若一渡江,军民混合,进退趋踰,周旋不遑”<sup>[8]</sup>,故特组织三千人的市民请愿团,请求夏氏顺从民意,将省署移汉,实现民治。另外又电京中央,恳请政府俯顺舆情,决定省署移汉。

受中央屡次电催及王占元诚恳劝驾,夏寿康为敷衍面子,特于23日上午偕同政务厅长沈泽生、财政厅魏联芳等赴武昌拜会王占元,随后“飭令政务厅将回署情形,并与王督和缓经过,报告中央”<sup>[9]</sup>,并定于25日回署办公。此后,夏寿康开始在武昌省署办公,省署移汉问题遂告结束。

## 五、余论

民初出现的一系列省长政潮乃至地方自治浪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由省制不确定所造成的。北洋时期的省级行政中以省长人选问题最为地方社会所关注,因省长问题牵涉地方各派势力利益。1920年的湖北省长人选问题,“由谁来担任省长牵涉到鄂省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再分配,成为

[1]《王统领来鄂与时局政潮之关系》,《公论日报》,1920年12月4日,第3张第5页。

[2]《王怀庆调停鄂事经过》,《民国日报》,1920年12月9日,第2张第6版。

[3]《鄂省署移汉问题》,《顺天时报》,1920年12月11日,第2版。

[4]《相持中之鄂省署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3日,第2张第6版。

[5]《孙传芳去后之鄂当局态度》,《晨报》,1920年12月19日,第3版。

[6]《相持不下之鄂省政局》,《民国日报》,1920年12月24日,第2张第7版。

[7]《鄂省之筹饷与省署两问题》,《申报》,1920年12月22日,第6版。

[8]《夏寿康赴武昌矣》,《晨报》,1920年12月27日,第2版。

[9]《省长回署之第一幕》,《顺天时报》,1920年12月30日,第2张。

1920年湖北各种势力角逐的焦点”<sup>[1]</sup>，同时也直接关系着鄂人自治运动的践行。于是希望实行自治的地方社会与试图维护既有地位的督军王占元在分权与集权、自治与官治、民主与专制的名义下，展开了利益诉求各异、过程错综复杂的权力角逐。

受“一战”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处于一个黄金期，西方民主自治观念在地方广泛传播，地方社会也日益掀起自治之风。时人意识到：“民族自决为世界潮流所趋，地方自治尤为各省风声所树。”<sup>[2]</sup>此次湖北省长人选政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地方社会在由专制走向民主建制，践行省自治中的一幅景象。湖北地方社会为贯彻鄂人治鄂之理念，故在省长问题上极力主张鄂人夏寿康担任省长，并进而实现军民分治。在经历一番周折之后，夏氏最终莅任省长，某种程度上亦可说是鄂人治鄂的胜利。

但夏寿康担任省长究竟能给鄂人带来多大实惠呢？仅从理念上看，实行军民自治、省长民选无疑是符合历史潮流的，然而落实到具体政治操作层面，就不得不受省情和政情的影响。从夏氏的日后执政历程来看，因地方实权多为王占元控制，其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夏氏虽贵为省长，却无任何实权，终究不过是督军之傀儡，军阀政治的牺牲品。“督军之势力一日存在，则省长一日为督军所有物，人民终一日不能伸其好恶。盖取舍省长之权，不在政府而在督军，则人民虽向政府愤争无益，是故今日而欲督军不干涉省长者，非废督无法。”<sup>[3]</sup>可见，在民主与专制、自治与官治的缠绕下，地方社会纵然有心借鉴西方民主自治精神并引为旗帜，无奈受时局和自治能力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却无力回天。

就鄂督王占元而言，夏氏因遵循鄂民之意实行自治，其执政之方针必然引起王“莫大反感”。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故干涉省长人选的任免，屡次反对夏氏莅任，甚至出现兵围省署这样轰动全国的事件。这一切行动的背后源于王占元对自身处境的担忧。回顾王占元督鄂，其重用鲁人、镇压荆襄自主、操纵议会，这一系列行为早已为鄂人所不满。此次政潮表明王占元执政已岌岌可危，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鄂人治鄂为中心的湖北自治运动的进程，并为日后驱王运动奠定了基调。

另外，湖北省长人选问题也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传统的观点认为自皖系政府主政到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全国，由于军阀派系操纵政局，中央权力衰微，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政令难达于地方。通过对 1920 年湖北省长问题的考察，不难发现北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不同且复杂的面向。中央虽处于弱势，但并未一味妥协，有时也态度强硬，并依靠各方势力迫使督军王占元承认夏寿康的省长地位，这在以往是非常少见的。由此可知北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因事并随着时局而变动，需以动态观点具体看待。

[责任编辑：肖 波]

[1]田子渝：《武汉五四运动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

[2]《鄂人反对省长之积极进行》，《晨报》，1920年9月11日，第6版

[3]《鄂省长问题》，《申报》，1920年9月23日，第2张第7版。